

□ 财经前沿

实现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路径探析

龚 敏 李文溥

【摘 要】我国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尽管快速提高了人均 GDP，但却不能有效地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旨在使我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翻番的“收入倍增计划”试图以提高居民实际收入为切入口，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 and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微观层面，要素比价扭曲是形成我国现有经济增长方式的微观基础，从而矫正要素比价扭曲是实现收入倍增计划的重要前提；从宏观层面，使现有经济增长转向以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为目的的“工资导向型”增长方式，是实现收入倍增计划的可行而且必要的途径。

【关键词】收入倍增计划；要素比价扭曲 “工资导向型”增长方式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3&ZD02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0JJD790001）

【收稿日期】2013-05-16

【作者简介】龚 敏，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李文溥，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特聘教授。（厦门 361005）

一、引 言

我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坚持既有经济发展方式所导致的重大问题是高投资促进了人均 GDP 迅速增长，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却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2011 年，我国人均 GDP 是 1978 年的 16 倍，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及农村人均纯收入分别仅为 1978 年的 10.5 倍和 10.6 倍。收入增长缓慢，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成为我国经济近十余年来结构失衡最重要的表现。2000 年至 2011 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从 46.4% 下降到 35.4%，年均下降了 0.92 个百分点^①。在世界 189 个国家按购买力平价以及可比价（2005 年价格）计算的人均 GDP 排序中，2010 年中国人均 GDP 为 7 746 美元，列第 91 位；但居民消费率为 44.2%，仅列第 171 位^②。这两个位次的差距，进一步凸显了我国经济的高增长没能快速提高居民收入，进而导致居民消费增长缓慢的事实。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使我国经济增长不得不严重依靠“投资驱动”和“出口拉动”；同时，经济结构体现出“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即“两高一低”的失衡特征。^[1-2]这一国民经济结构的失衡特征已成为目前以至今

① 《中国统计年鉴》（2012 年）。

②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生产、收入和价格国际比较研究中心（CIC），Penn World Table 7.1。

后一个阶段我国经济难以健康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

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及十八大报告都提出了在 2011 年至 2020 年内,使我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翻番的“收入倍增计划”,试图以提高居民实际收入为切入口,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 and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然而,收入倍增计划的实现需要怎样的经济发展方式的保证?收入倍增计划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有效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并保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本文首先从微观层面,提出要素比价扭曲是形成我国现有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失衡以及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的微观基础,从而矫正要素比价扭曲是实现收入倍增计划的重要前提;其次从宏观层面,提出使现有经济增长方式转向以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为目的的“工资导向型”增长,是实现收入倍增计划的可行而且必要的途径;最后,提出相关政策设计框架。本文拟为研究我国经济跨越人均 GDP 5 000 美元、进入后赶超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一个综合的理论分析框架。

二、实现收入倍增计划的微观基础: 矫正要素比价扭曲

1. 形成要素比价扭曲的体制性原因分析

始于 1978 年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甚至核心的内容是价格的市场化。从单一的指令性价格到指令性价格与指导性价格并存,从价格双轨制到向单一的市场价格并轨,从仅有即期市场到建立远期市场,从只有商品市场到资金、土地、劳动力、资源等各类要素市场的逐渐形成,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一个市场价格体系的重建、恢复和形成的过程。经过三十余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大部分最终商品已经基本能够由市场供需决定价格。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至今尚未完成,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实行以 GDP 及财政收入最大化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方式,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扰,我国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在较长一段时期里受到阻滞,市场化进程相对滞后。要素价格因行政干预而严重扭曲。没有合理的要素市场定价,商品市场的价格也就不可能合理。

要素比价扭曲是指由于市场不完善导致的生产要素价格与其边际产出或机会成本之间的偏差或背离。其中,正向扭曲是指要素价格大于或超过其机会成本或边际产出所决定的均衡价格;负向扭曲则是指要素价格小于或低于其机会成本或其边际产出所决定的均衡价格。^[3]大部分现有的研究认为我国要素市场存在负向的价格扭曲。^[4-7]

负向的要素比价扭曲产生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下的各级政府奉行以 GDP 和财政收入最大化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在政府主导型经济中,对经济增长及财政收入最大化的追求,必然使各级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地扩大投资。降低投资成本成为吸引投资的最重要的保障。在过去的三十余年里,通过负向扭曲要素比价吸引资本,并在出口的带动下,我国经济成功实现了快速增长。然而,要素市场市场化改革的滞后,特别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从根本上阻碍了我国要素比价随着经济增长、要素相对稀缺程度的变化而适时相应调整。

2. 要素比价扭曲的宏观经济成本

现有文献中,有关要素比价扭曲所产生的宏观经济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讨论。一是,要素比价的扭曲导致了我国经济结构的失衡。李稻葵和徐翔, Zhu, 樊纲等, Huang & Tao, Huang & Wang 等探讨了由于要素比价扭曲导致了我国经济表现为“高投资、低消费”的内部失衡,以及“高出口、经常项目顺差”的外部失衡。^[8-12]二是,要素比价扭曲会损害我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张杰等, Hsieh & Klenow 测算了我国经济由于要素比价扭曲导致资源错配,从而生产效率下

降的程度。^[13-14]三是,如 Lu & Jiang, Herterl & Zhai 集中研究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对城乡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影响。^[15-16]总的来看,大多数现有研究主要针对不同要素市场,如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和能源市场等各自分割开来展开研究,少有研究能够在统一的框架下,系统分析要素比价扭曲可能产生的宏观经济总量与结构的影响。

这里,我们构建一个分析框架以说明要素比价扭曲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如图 1 所示,首先,由于要素市场上生产要素的价格(劳动力、利率、土地以及自然资源环境等)严重偏离市场供需关系,投资的低成本使经济严重依赖“投资驱动、出口拉动”的增长方式。其次,在收入分配层面,由于人为地压低了劳动者报酬,低工资直接导致劳动者报酬占比持续下降;同时,政府收入占比及企业收入占比持续提高。这一事实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所具有的“利润驱动”特征。最后,要素比价扭曲所导致的资源错配还严重制约了我国产业结构的适时升级换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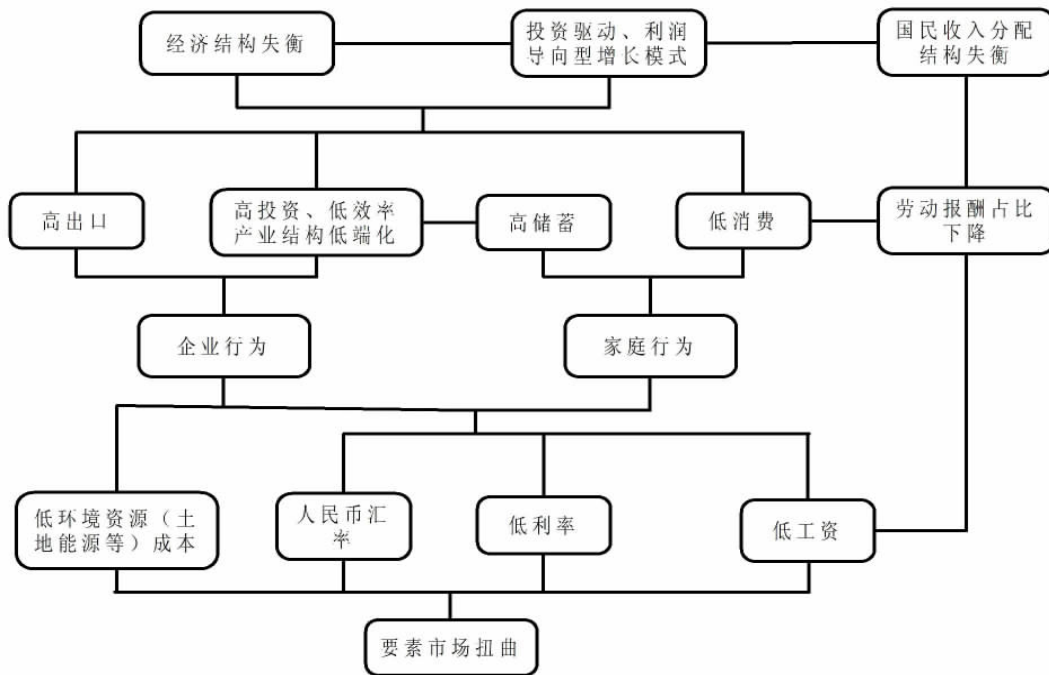


图 1 要素比价扭曲对宏观经济结构失衡的影响

以“投资驱动”和“利润驱动”为特征的增长方式,导致我国人均居民实际收入增长长期滞后于人均 GDP 的增长,并使“两高一低”的失衡结构得以固化。其结果是,不仅我国居民难以同步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而且维持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还可能使我国经济发展逐渐脱离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难以充分体现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优越性,实现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可以认为,矫正要素比价扭曲是实现下一阶段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微观基础保障。通过矫正要素比价扭曲,可使我们从根本上实现收入倍增并缩小收入差距,推动中国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①,迈向现代发达经济。

^①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以来,这一概念迅速成为国内经济学界的热词。然而,有学者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考察认为:任何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都存在着“陷阱”,都必须解决特定发展阶段面临的问题,也就是说:发展处处有陷阱,不仅中等收入。这一观点显然值得重视。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实现收入倍增计划的可行而且必要的途径

通过行政干预、实行负向要素比价扭曲的既有赶超型发展战略的最大缺陷是：尽管它促进了高投资从而实现了人均 GDP 的快速增长，但却导致居民作为要素所有者的所得偏低，不能同步分享经济高速增长收益，快速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我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速多年来低于人均 GDP 增速。高速增长所形成的产品在国内实现消费需求非常困难，不得不通过高出口在国际市场寻求平衡。扣除物价变化因素后，1990 年至 1999 年期间，我国人均 GDP 增速平均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快 2.3 个百分点，比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速快 3.05 个百分点；2000 年至 2009 年期间，人均 GDP 增速平均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快 0.61 个百分点，比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速快 3.57 个百分点。特别在近十年里，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低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扩大。从 1990 年的 2.3: 1 扩大到 2009 年的 3.4: 1。近两年虽然有所回落，但 2011 年仍高达 3.1: 1。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1 年我国的人均 GDP 分别为 1978 年的 5.8 倍、8.9 倍、14.7 倍、16 倍，但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仅为 1978 年的 3.8 倍、6.1 倍、9.7 倍、10.5 倍；农村人均纯收入分别仅为 1978 年的 4.8 倍、6.2 倍、9.5 倍、10.6 倍。1978—2011 年，GDP 增速与居民收入增速累积相差 5.5 倍。

观察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收入的构成变化可以看到，城镇家庭人均收入中工资收入所占的比重虽逐年下降，但是，2011 年仍占 64.3%；财产性收入占比尽管逐年提高，2011 年也仅为 2.71%；转移性收入基本稳定在 24%。农村居民收入中工资收入占比逐年提高，2011 年工资占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已经上升到 42.5%，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比大幅下滑，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占比缓慢提高。这说明：工资收入已经或正逐步成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提高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是确保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从而实现收入倍增计划、缩小居民内部不同阶层收入差距的关键之一。

伴随着我国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变化，矫正要素比价扭曲、实现收入倍增的一个重要环节必然是提高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然而，矫正要素比价扭曲，必须基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同步提高劳动报酬。这是短期内改善收入分配结构、长期内促进消费扩张、人力资本投资、企业创新、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经济增长从而实现收入倍增的重要途径。我们认为，在接下来的 10—15 年时间内，应使我国经济增长从现有“投资驱动”和“利润驱动”的增长方式逐步转向旨在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工资导向”的增长方式。也就是，转向“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者报酬——扩大总需求——促进充分就业——扩大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的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强调促进经济的有效供给能力，其本质在于，通过矫正要素比价，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产业技术进步，提高产业生产水平，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以此为基础，提高劳动生产率，最终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这种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为导向的包容性发展战略是一个系统性的设计，需要政府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重视实现增长的社会发展目标，改善民生福利水平，调整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充分就业。这同时也是我国经济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四、旨在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工资导向型”增长方式

政府对 GDP 增长及财政收入的追逐，通过行政干预形成负向要素比价扭曲是导致我国现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原因。因此，可以认为，矫正要素比价扭曲是我国经济在后赶超阶段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微观基础保障；基于矫正要素比价扭曲而实现的收入倍增计划，立足于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恢复劳动与资本的市场力量均衡，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实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下一阶段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与收入倍增计划的可行路径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现有的“投资驱动、出口拉动”或“利润驱动”的增长方式转向旨在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并使经济增长依靠“内需驱动”为主的“工资导向”的增长方式 (wage-led growth model) (如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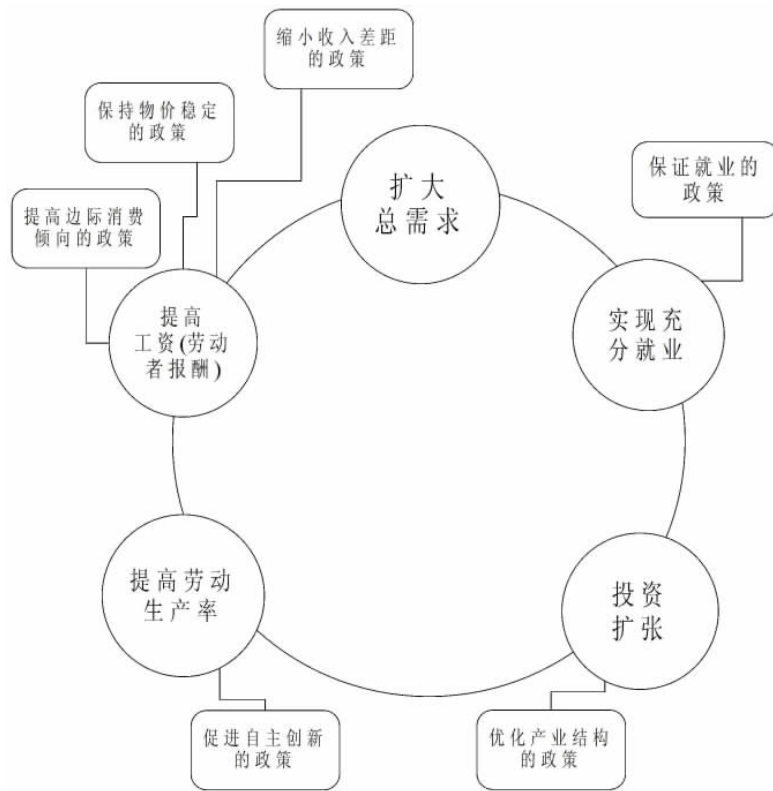


图2 旨在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工资导向型”增长方式及其政策配套设想

在西方发达经济体，“工资导向”的增长方式是基于后凯恩斯增长理论 (post Keynesian growth models) 而提出的，与正统的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有较大的不同。“工资导向”的需求理论强调基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工资，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进而拉动需求扩张。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西方主要经济体劳动者报酬占比开始呈现长期下降的态势。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主要经济体劳动生产率与工资脱钩的现象进一步延缓了这些国家经济复苏的步伐。这些问题激发了有关工资增长是否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强化效应的研究，以及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长短期相互作用机制的分析，继而推动了后凯恩斯增长理论或“工资导向型”增长方

式的研究。^[17-18]西方经济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和探讨值得借鉴。但是,中国的要素比价扭曲形成的原因及机制似乎更为复杂,要素比价扭曲的范围也更广泛一些。因此,需要在借鉴的基础上形成更多立足中国国情的研究。

国际范围的发展经验表明,对于采用“出口导向型”发展方式的赶超型经济体,工资的上升(劳动者报酬占比的提高)能否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决定这些经济体发展方式能否成功转型的关键。以日本为例,其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工资水平的上涨非常明显。以2000年为100,1955年日本平均工资仅为2000年的5.1%,1960年提高到6.3%,1970年提高到18%,1980年提高到61.6%^①。与此同时,其劳动生产率的改善也同样显著。1955年单位劳动的GDP不到美国的25%,1970年提到50%,1980年提高到美国的70%^②。基于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上升的工资水平确保了日本人均收入的快速提高。Fukumoto & Muto总结了日本经济在其高速增长时期“收入倍增计划”实施成功的两个重要原因^[19]:工资的大幅提高(工会的力量)以及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他们的研究肯定了提高工资与利率市场化对改善日本产业结构以及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的作用。在产业结构方面,1960年日本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为46.4%,1965年提高到50.3%,1975年提高到55.9%,1980年进一步提高到60.3%;同时,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相应从1960年的40.8%下降到1980年的36.2%^③。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矫正负向要素比价扭曲对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产业技术更新、推动创新具有积极作用。我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也提供了类似的经验。

具体到我国经济,旨在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工资导向型”增长方式能否适用于后赶超阶段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需要,将取决于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 工资的提高(劳动者报酬的改善)对现阶段我国就业市场的影响。短期内,工资水平的提高会对就业产生一定的压力,这就需要宏观政策在保障就业方面有相应的配套,其中,包括加大职业技术培训教育的力度以扩大就业者的就业机会等。

(2) 工资的提高(劳动者报酬的改善)能否促进我国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短期内工资水平的提高要能够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需要在宏观配套政策方面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以及采用新技术。同时,在更多的领域鼓励市场公平竞争,也是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性保障。

(3) 工资的提高(劳动者报酬的改善)对企业投资需求及资本积累的影响。短期内工资水平的提高会对企业的利润创造产生负面的压力,然而,国内外的经验研究都证实,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相联系的劳动报酬提高,将会促进利润总额、利润率的提高。与此同时,辅之以宏观调控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如结构性减税等将有利于减轻企业的税负,调整投资的行业结构,从而优化产业结构。

(4) 工资的提高(劳动者报酬的改善)要能够最终扩大居民的消费,还需要在配套的宏观调控政策方面,实施稳定价格水平的货币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通过公共财政支出向民生方面的倾斜以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和缩小收入差距。

[参考文献]

[1] 李文溥、龚敏 《要素比价扭曲与居民消费不振》,《高校理论战线》,2013年1期。

① 数据源自CEIC数据库。

②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生产、收入和价格国际比较研究中心(CIC),Penn World Table 7.1。

③ 数据来源:日本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go.jp/english/data/handbook/c03cont.htm#cha3_3。

- [2] 李文溥、龚敏 《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导向的粗放型增长与国民收入结构失衡》，《经济学动态》，2010年7期。
- [3] 姜学勤 《要素市场扭曲与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效果》，《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12期。
- [4] 罗德明、李晔、史晋川 《要素市场扭曲、资源错置与生产率》，《经济研究》，2012年3期。
- [5] 康志勇 《赶超行为、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就业的影响——来自微观企业的数据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12年1期。
- [6] 陈永伟、胡伟民 《价格扭曲、要素错配和效率损失：理论和应用》，《经济学季刊》，2011年4期。
- [7] 张曙光、程炼 《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要素价格扭曲与财富转移》，《世界经济》，2010年10期。
- [8] 李稻葵、徐翔 《市场机制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基本动力》，《比较》，2012年6期。
- [9] Zhu X-D. Understanding China's growth: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2, 26 (4): 103 - 124.
- [10] 樊纲、王小鲁、马光荣 《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研究》，2011年9期。
- [11] Huang Y-P, Tao K-Y. Causes of and remedies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external imbalances: The role of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 ADBI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79, 2011.
- [12] Huang Y-P, Wang B-J. Cost distortions and structural imbalances in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2010, 18 (4): 1 - 17.
- [13] 张杰、周晓艳、李勇 《要素市场扭曲抑制了中国企业 R&D》，《经济研究》，2011年8期。
- [14] Hsieh C-T, Klenow P J. 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 124 (4): 1403 - 1448.
- [15] Lu M, Jiang S-Q. Labor market reform, income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2008, 16 (6): 63 - 80.
- [16] Herterl T, Zhai F. Labor market distortion, rural-urban inequality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s economy.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455, 2004.
- [17] Stockhammer E, Onaran O. Wage-led growth: Theory, evidence, policy.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2012.
- [18]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Towards a sustainable recovery: The case for wage-led polic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bor Research*, 2011, 3 (2).
- [19] Fukumoto T, Muto I. Rebalanc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Some insights from Japan's experience. *China & World Economy*, 2012, 20 (1): 62 - 82.

[责任编辑: 赵东奎]